

# 懷念慰堂先生

王 省 吾

**In Memory of Dr. Chiang Fu-tsung**

Sing-wu Wang

## ABSTRACT

I worked as librarian for 41 years. Half of my working life had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Dr. Chiang Fu-tsung. I started my library career in the Library of the National Planning Board in 1944. In 1945, I was transferred to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Both of them were located in Chungking and under the directorship of Dr. Chiang.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with Japan, I was sent by Dr. Chiang to Nanking to help reopen the national headquarters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n 1948, I was directed again by him to escort the first instalment of the Library's rare books incorporated with other national collections to be moved to Taiwan. I quit my job in the Library and became Chief Librarian of the Yang Ming Shan Institute Library in 1949 while Dr. Chiang was in Europe. The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Dr. Chiang, appointed me as Director of the Taiwan Provincial Library in Taipei in 1955. But I was very sorry to leave Taiwan against his will to take up my position in the Orientalia Sectio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in Canberra in 1964. Throughout my working life, even after I left Taiwan, Dr. Chiang was always very kind to me, treating me as one of his family members.

蔣慰堂先生於1990年9月21日在臺北逝世，我到10月初才在「中央日報」國外版上看到消息。哲人其萎，有如晴天霹靂，非常哀痛。他獨身來臺，一直住在中央圖書館宿舍，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後，改住該院宿舍。後來聽說，他的小兒子自大陸前來與他同住。我認識他的大兒子祖安兄，但

---

\* 著者曾任澳洲國立圖書館東方部主任

不知道他的小兒子。當時想寫封慰問信，不知向誰投寄，但我仍按他的地址寄去。他的小兒子沒有給我回信，最近才自美國找到他的孫子蔣學寧先生給我來了一封信。他在臺灣的後事，想有故宮博物院的同人爲他處理。他一生爲圖書古物，爲國家，犧牲自己的家庭生活，正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我自1944年進中央設計局圖書館，至1985年自澳洲國家圖書館退休，四十一年以來，全部時間，均在圖書館工作。無時不承慰堂先生提携愛護，有如子女。過去二十多年，我違背他的意思來澳洲，未能在他暮年期間，盡點照顧責任，至今想來，深感內疚。

我於1944年6月畢業於浙江大學史地系史組，當時國家在日本威脅之下，所有個人的經濟均十分困難，我考慮到畢業後，無錢買書，以爲進圖書館工作，不怕無書可讀。經浙大史地系主任張曉峯老師的介紹，在重慶的慰堂先生便接受我在他當時兼任的中央設計局圖書館工作。與我同時進設計局的，尚有社會教育學院圖書館系畢業的儲連甲先生。我與儲先生在那裏做了幾個月工作，第二年5月被調到在兩浮支路的中央圖書館。在中央設計局圖書館時，我做的是秘書工作。到中央圖書館後，慰堂先生說，圖書館的基本工作是編目，便將我安排在編目組，擔任中文編目員。我沒有受過圖書館訓練，而在那裏負責中文編目的張遵儉先生，適因夫人有病，在請假中。他叫我仿照張先生所做的編目卡片，依樣畫葫蘆，邊做邊學。不久，慰堂先生又交來他自己正在編纂的「中央圖書館分類表草稿」囑我進行補充。此表係根據「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將知識分成五十大類，各類再輔以中國傳統分類分目，並分寄各類專家審訂，已大致完成。中央圖書館在臺灣復館後，他並向我提起此事，當時他與我均分別忙着館務，未能再進行檢討，原稿現在應仍存在中央圖書館檔案內。

1945年8月抗戰勝利。是年年底，慰堂先生派屈翼鵬先生、蘇瑩輝先生、儲連甲先生及我等八人回南京成賢街原中央圖書館，辦理接收日人在地質研究所及澤存書庫所藏中日文圖書。接收完畢，即進行編目。慰堂先生提升我任中文編目股股長。幸張遵儉先生回館工作，雖爲時甚暫，但我在他處所學甚多。當時急着對外開放，因有慰堂先生的鼓勵，我們的編目數字，約每日一百種。

1948年年底，徐州陷落，戰事逼近南京，最高當局決定將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古物與圖書運離，以策安全。教育部設立圖書古物搬運小組，由該部次長杭立武先生

任組長，負責策劃搬運工作。我被派代表中央圖書館參加。慰堂先生爲什麼派我做他的代表，我不知道；但他愛護我，信任我，訓練我的意思，是可以肯定的，實在感激之至。當時擬議安放圖書古物的地方有數處，最後決定運往臺灣。初議時，只准個人前往，後來改變主意，可帶家眷。第一批運出古物與圖書，包括中央圖書館宋元明善本圖書六十箱，由海軍派軍艦運輸，於12月20日離南京，運抵臺灣基隆港，恰是除夕。押運隊隊長爲李濟之教授，隊員有故宮博物院的莊尙嚴先生，中央博物院譚旦岡先生，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勞貞一先生及我等，以後再運了二批，中央圖書館部分，分由昌彼得先生、儲連甲先生、屈翼鵬先生、蘇蔭輝先生、顧華先生等押運。圖書與古物先安置在桃園楊梅，然後運至臺中，借用臺中糖廠倉庫儲藏，並利用其後面靠近振興路之空地建造宿舍，安置員工。慰堂先生因聯合國文教組織之邀，來臺視察運臺圖書後，即轉往歐洲考察。他自歐洲歸來後，留在香港教書，研究宋史。當時所有員工不單無薪水，也無工作，直至1949年10月教育部成立「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館聯合管理處」，以杭立武先生爲主任後，情形稍有改變。聯合管理處下設有中央圖書館組，由顧華先生任組長。

我於1949年8月因張曉峯老師之邀，辭去中央圖書館的職務，上臺北陽明山任陽明山莊圖書課課長（實際爲圖書館主任），直至1955年10月受命擔任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館長止。在這段期間，慰堂先生已自香港回到臺灣，繼續研究宋史，並在臺灣大學任課。他於1954年9月接到教育部的命令，重任中央圖書館館長，負責籌備復館。1955年5月，又因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館長吳克剛先生辭職，奉命兼任該館長。我之被調任臺北圖書館館長之職，實因他向臺灣省教育廳竭力推薦的結果。我在臺北圖書館期間，無時不得到他的指導與協助。

1957年11月，日本國會圖書館與聯合國文教組織日本國內委員會共同發起，在東京召開「印度太平洋區域出版品國際交換研討會」，慰堂先生爲使我與丁德風先生增加見識，並建立國際圖書館界關係，向教育部建議，派我們兩人前往參加。丁德風先生當時係中央圖書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主任。今後，我們有一個星期的時間，參觀日本的圖書館與出版事業。在東京時，我遇見代表澳洲出席會議的澳洲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館長懷特（Harold L. White）先生，此是他後來邀請我去澳洲國家圖書館擔任東方部工作的起因。

1959年，又蒙慰堂先生大力推薦，得到當時美國派駐臺灣援華機構圖

書館顧問費士卓 (William A. FitzGerald) 博士與美國新聞處圖書館館長施金納 (Emma K. Skinner) 小姐的支持，被選為美國國務院外國圖書館員計畫 (Foreign Librarian Program) 1959-1960得獎人之一。

我於1959年5月去美國，於1960年6月回國，在美國共一年零一月。除有一個月由美國國務院安排訪問各重要大學圖書館與公共圖書館外，其餘時間在克里夫蘭公共圖書館 (Cleveland Public Library) 實習，並在西方儲備大學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圖書館學院選課。

我得到以上兩項經驗，不僅增加自信，且瞭解日本與美國兩國圖書館的管理方法與圖書館對讀者的服務工作。我回臺北以後，即積極調整臺北圖書館的內部工作，並改善對讀者的服務，特別增加兒童與青少年的服務工作。同時又鑑於臺北圖書館與臺灣省博物館擁在一處，彼此不能發展業務，曾屢次向臺灣省教育廳呈請興建館舍，均因經費關係，未有結果。1961年初，臺灣省博物館房屋因年久失修漏雨，省政府核撥專款翻修，臺北圖書館為配合工程進行，必須遷出。我即利用此機會，並得到慰堂先生的支持，向當時臺灣省政府教育廳長劉白如先生請求，劉廳長亦深感博物館與圖書館性質不同，合用一館舍，確非長久之計，決定准許臺北圖書館進行修建館舍，並撥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作為第一期建築費用；但地點的選擇與館舍的設計，須由臺北圖書館自行接洽辦理。幾經奔走努力，並承臺北市政府的協助，幸得到在臺北市中正路的臺灣省立臺北工業專科學校的同意，利用該校靠近新生南路體育場旁邊空地建造一建地3,300平方公尺四層新館。工專的條件，須在新館後邊為該校修建一同樣高度的圖書館。新館工程於1961年開始至1964年我離臺北來澳洲堪培拉 (Canberra) 時，第一第二兩層已對外開放，第三層正在建築中。在接洽及籌建新館舍期間，我時時向慰堂先生請教，承他帶領，使我在諸事上均能順利進行。

在上面，我曾提到澳洲國家圖書館館長懷特先生曾問我去澳洲幫助他辦東方圖書館的興趣。我當時隨便答覆，早已忘記了。1964年2月，他到馬尼拉 (Manila) 開會，專程來臺灣訪問，又問我去澳洲的事，他說，他已向澳洲政府請准設立東方部，急須我前去主持辦理。他要我先去兩年，後來再看雙方是否同意延長時間。我說，去澳事，原為戲言，如他真的要我去，須讓我好好考慮，同時臺灣省政府可能只能讓我出去一年，二年定有困難；他同意讓我考慮。回去後，於4月27日再來信，說明聘用一年，但說能延長二年最好。我於7月25日簽請臺灣省教育廳潘振球廳長，准予停薪留職一年前往，並提議派臺北圖書館研究員陳榆生先生轉任館長。

我的簽呈於9月16日核准，於10月17日辦理移交，20日起程來澳，21日到達堪培拉。到堪培拉後，懷特館長即鼓勵我接家眷前來，並將我的聘期延長到1964年10月。內子樓占梅偕三女於1965年10月初抵澳。在她們來澳前，我已於6月5日簽請臺灣省教育廳潘振球廳長准我辭去省立臺北圖書館館長職務。因澳洲國家圖書館待我極厚，給我全權處理中日韓文採購，編目及服務事宜，且允許我在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歷史系研讀碩士學位。澳洲人忠厚誠懇，非常容易相處，與在臺灣人事紛爭、經費不足等情形相比，完全不同。我抵澳後，立刻有感覺，此係一理想之點。在此點上，我非常對不起慰堂先生。

早在我離臺前，慰堂先生已透露，將來他退休後，即推薦我任中央圖書館館長。當時我在臺北圖書館，既少人手，且無充足經費，整日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之感覺。再加上那時的政府，喜歡小報告，經常應付督學查詢，難有安心辦事之日。中央圖書館的情形，亦相當複雜，我存心擺脫此等無為苦惱，我來澳以後，慰堂先生接二連三來信，要我於得到學位後，即回去接替他的工作。1965年9月政府發表命令，任他為故宮博物院院長。仍暫兼中央圖書館館長，他的來信更多，要我提早回去，並稱他的推薦，已得到教育部的同意。他除寫信給懷特館長，要他放我回去，又請當時駐澳大使陳之邁先生，勸我以國家為重。我因此寫了許多信，向他解釋，並沒有得到他的諒解。他於1966年9月辭中央圖書館館長之職，專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又來信催促。經我仔細考慮，認為屈翼鵬先生為中央圖書館老人、目錄學家、經學家，由他出任中央圖書館館長，最為妥當。我除向慰堂先生建議外，另寫信給翼鵬先生，解釋我的情況，務請他對此職予以考慮，幸屈先生能勉為其難，答應只任館長一年，此事總算得到解決。慰堂先生對此事一定耿耿於懷，但他一點也沒有表現出來；我知道他以寬宏大量之心，饒恕了我。以後，他仍像過去一樣愛護我，鼓勵我，以親熱的態度對待我。

我曾於1980年與1983年兩次回到臺灣，每次均承慰堂先生接至故宮博物院，遺贈故宮印品，與招待吃飯，親如女兒回家，撫慰有加，使人十分感動。1985年我自澳洲國家圖書館退休，他來信，稱「兄退休來臺，歡迎之至，此間有五個圖書館學校，兄可在一校專任，餘兼任，生活可以對付，不必掏腰包也，朋友常聚，至足樂也」，關愛之情，溢於言表。1987年11月12日為慰堂先生九十大壽，在臺圖書館界及他的朋友發起徵文祝賀，來函相約，當即寫成「十九世紀下半期華工在澳洲淘金謀生方略」，作為

我向他報告在澳洲研究的結果，他以後每次來信，均不忘邀我回臺教書。

慰堂先生著作，除「圖書館管理法」，「圖書與圖書館」，「珍帚集」，「宋史新探」、「信訓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及歸納以上的「珍帚齊文集」外，未完成的，就我所知，尚有「中國目錄學講義」，及本文所提到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圖書分類法」等。他於工作餘暇，僅偶然與朋友引吭高歌崑曲，但大部分時間均用在書本上，於目錄學、圖書館學、博物館學、宋史、天主教義外，遍及中外歷史文化方面，均有很深研究。加上他有豐富的行政經驗，與奉事維謹的宗教信仰，故對人應事均能隨心所欲處理，無不適當。他曾說，「我是一個圖書館員，沒有讀過博物館學，我是用圖書館的原理，來處理博物館的業務。圖書館的基本原則是公開。我對美國畢茲堡的公共圖書館的大門上，寫了一句：「公開給民衆」，給我很大的刺激，覺得做公共的僕役，服務公共的民衆要全心、全意、全力為公共服務；要像圖書館的全部公開，為民衆服務。其實所有機關，都應公開一切，應該為公衆服務」\*。慰堂先生從辦理圖書館的經驗，悟出辦圖書館的道理，可以應用於博物館，也可應用於一切為公衆服務的機構。正因為他用力之久，故能一旦豁然貫通，慰堂先生已到達通人地步。

所有知道他或與他有接觸的人，對他患病不久，即離世而去，莫不深感哀痛，但他能享九十二歲高齡，實在已很稀有。我們為紀念他，不僅不要忘記他一生對領導與發展中國圖書館與博物館事業的貢獻；且要將他平日戰戰兢兢敬業的態度，孜孜不倦鑽研學問的精神，與堅定不移對天主的信心，作為我們後輩，在其圖書館與博物館的同人學習模仿的榜樣。

1991年2月24日於堪培拉

\* 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國立故宮博物院」，臺灣商務，1977，242-243頁。